

# 面向歷史複雜性的轉型正義： 中東歐經驗給臺灣的啟示

花亦芬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980年代東歐與蘇聯推翻共產黨專政的民主化浪潮，被當時的臺灣媒體稱為「蘇東波」。這股潮流對臺灣的民主化進程也造成巨大影響：從解除戒嚴（1987）、野百合學運（1990）、廢除刑法 100 條確保言論自由（1991）、以迄於第一次民選總統（1996）。如果我們把上個世紀末臺灣民主化的歷程放在世界史架構來看，我們不僅跟這股「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同步，當時的臺灣也熱烈分享了所謂的“the Spirit of 1989”，也就是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以及東歐共產集團相繼解體，讓世人對人類世界往民主自由方向更往前邁進一大步懷抱著樂觀的展望。對臺灣而言，相對於天安門大屠殺帶給中國民主運動巨大挫敗、終至今日陷入中國國族主義與天朝主義內向性思考的惡性循環難以善了，這股認定自由民主之路才是臺灣生存發展之道的思潮，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磨礪考驗，的確成為臺灣在 21 世紀選擇努力與國際社會接軌的基調與底蘊。

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在 1989 年針對當時的世界情勢發表過一篇著名的論文〈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註1），他在文中大膽預測，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制度是人類政治文化演進的終點，也是人類政治體制的最終形式。然而，當時讓福山感到可以樂觀前瞻的直線發展願景，若從這些受「蘇東波」鼓舞而積極走上追求民主自由的國家（包括臺

本文原為 2016 年 8 月 27 日於李登輝基金會舉辦之「人民直選總統暨臺灣民主發展二十週年研討會」發表之會議論文，原文名稱為：〈面向歷史複雜性的轉型正義〉。經修改後完稿。

灣)在1989年之後所走過的路徑來看,真正的歷史實況卻是,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裡,大家(包括臺灣)都跌跌撞撞走了不少崎嶇蜿蜒的民主之路,而且至今還不斷在調整方向、修正腳步中。(註2)雖然這些崎嶇的路程並沒有讓當時努力追求民主轉型的國家重回專制集權之路,但卻讓大家深刻體認到,由威權政治轉向民主法治並非一蹴可幾,也不是僅靠熱情可致;而且,更重要的是,歷史,並不如福山當年所想像的那樣,有著一個明確筆直的發展軌跡可以事前來作預測。

中東歐過去累積的轉型正義經驗清楚顯示出,轉型正義需要處理的過去就像一個潘朵拉的盒子,打開之後會讓人深深看到的是:歷史的真相,是相當複雜的;用黑白二分法來看歷史,最終常常落入自陷困境而無解。這樣的經驗應該可以提醒我們,如果我們要思考臺灣的轉型正義如何可以做得更穩健,就應該先調整好面對過往歷史的心態。因為轉正義不僅要處理無辜受害者人權受損的問題,有些部分也牽涉到比較複雜的人性問題,一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威權體制引發出人性之「惡」的問題。(註3)

因此,本文的討論重點將以「認知歷史的複雜性」為出發點,透過中東歐及德國的經驗,來看臺灣在推動轉型正義時,該做好什麼樣的心理準備,以跳脫過去中國官史一味從統治者的角度談論「忠奸賢佞」的黑白

二分思維、或是國族主義傾向採取的「我者」/「他者」之分,而能改從普世人權的角度重新看待過往的歷史?並能以多元寬容面對歷史真相的心,來撫平歷史傷痕,以追求和解與社會的良善為轉型正義真正的目標與願景。

## 歷史的複雜性

我們常說臺灣的歷史很複雜,但這應該是一種迷思。因為當我們這樣說時,對照組的國家常是英國、法國、日本、美國……這些在近代世界政治發展軌跡上,可以尋繹出有很強烈主流力量在引領政局發展的「大國」或「強國」。如果我們願意好好了解世界上小國的歷史,就會發現,小國的歷史很少能「不複雜」。跟臺灣一樣複雜、或比臺灣更複雜的小國歷史,在世界史上比比皆是。

就以捷克的二十世紀史為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是被奧匈帝國所統治;一戰至二戰戰間期(1918-1938),則與斯洛伐克(Slovakia)合組民主共和國;1939-1945年間淪為德國納粹政權的傀儡保護國(Reichsprotectorat Böhmen und Mähren),並與斯洛伐克分離;1945-1948年間重新返回民主政體,再度與斯洛伐克合併;1950-1960年代受俄共控制的捷克共產黨統治,改名為「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1968年「布拉格之春」,但最後遭

到蘇聯軍事鎮壓；1970年代至1989年逐步展開與共產政權抗爭時期，直至1989年透過所謂「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推翻共產黨政權，重獲民主自由。1993年元旦平靜地與斯洛伐克分道揚鑣（Velvet Divorce），各自成為獨立的民主共和國，並加入聯合國。政治體制更迭如此頻繁，一般常人如何因應專制與民主政治不斷交替時勢必會產生的種種變動狀況以求安身立命，這本身就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討的歷史問題。

另外再舉一個例子來看。最近剛過世的著名匈牙利小說家彼得·艾斯特哈茲（Péter Esterházy, 1950-2016）家族原是匈牙利最古老、最有財勢的貴族家庭之一，他的祖父曾在一戰末期（1917-1918）出任匈牙利總理，但是到了1948年共產黨上臺後，家族所有財產都被共產黨沒收，全家也被流放，直到1957年才准重回布達佩斯。因此他從一生下來，過的就是家道中落後的普通平民生活。2000年，他將自己的家族史以小說體裁書寫出版，名為《天堂的和諧》（*Harmonia Caelestis*），書中的內容也敘述了他自己的父親在共產黨統治下如何被剝除了爵位，成為一名瓜農的受難史。然而，隨著民主化後的匈牙利政府將秘密警察檔案資料解密，就在《天堂的和諧》快要出版前幾個月，他卻得知，父親固然曾經遭到共產黨整肅，但父親也是長期為匈牙利共產黨服務的線民，而且對不少親朋好友都告過

密。這個真相的揭露，讓艾斯特哈茲非常震驚，也促使他在2002年出版另一本小說：《修訂版本》（*Javított kiadás*, 英譯 *Revised Edition*）。在這本小說裡，他探討了父親在共產黨執政時期，個人尊嚴如何被碾碎，終而選擇屈服在匈牙利共產黨的意志之下，出賣自己的親朋好友。（註4）

這樣的故事在納粹時期、或是冷戰期間共產黨統治下的中東歐屢見不鮮。另一個著名的例子亦可見於東歐民主轉型後，波蘭第一任民選總統華勒沙（Lech Wałęsa, 1943-）身上。中東歐國家在共產黨統治時期，有不少人既是威權政治的受害者、但同時也參與加害他人的行徑，如波蘭團結工聯領袖華勒沙既領導團結工聯抵抗共產黨、同時卻又身兼收受共產黨好處的線民，甚至日後被團結工聯夥伴告上法庭。面對這種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共業」（diffused guilt），（註5）即便在波蘭實施「除垢法」後，華勒沙還是有辦法隱匿相關資料，順利通過檢查；而且在2008年，波蘭「國家記憶局」（Institute of National Remembrance）出版了兩位歷史學者合著的專書討論華勒沙曾是共產黨線民的問題，（註6）但仍無法讓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承認自己過去的確做了不該做的事。直至今（2016）年2月波蘭「國家記憶局」再度公布華勒沙在1970年代曾為波共線民的資料，而讓這個一再引發高度爭議的議題重新又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註7）

這些例子讓我們看到，中東歐轉型正義真正艱難的部分，不是在於如何為有重大犯行的加害者定罪，而是在於如何處理有些加害者（或共犯）同時也是受害者的「共業」問題。這個狀況也是何以當年波蘭的除垢法遲遲無法上路的主因之一。因為波蘭一直無法找齊 21 位有意願的法官負責審理具有高度道德爭議性與政治敏感度的除垢問題，一直要到 1999 年才有辦法讓除垢法正式施行上路。（註 8）

跟中東歐前共產國家來比較，臺灣的情況呢？我們是否能在他們的歷史經驗反襯下，好好釐清臺灣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性質究竟為何？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關係有多少可能的種類？是比中東歐單純許多，可以清楚將加害者與受害者區分出來？還是有些人的部分也許有可能牽涉到千絲萬縷糾結在一起的複雜關係？這些是我們在處理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問題時，應該更細膩、更審慎先進行了解的。

如果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相對之下的狀況比較單純，或是本質上的確單純許多，那我們就該有信心好好推動臺灣的轉型正義上路。如果發現有一些案例可能類似於中東歐這種「共業」的現象，那臺灣社會就須好好思考，需要提出什麼樣具有道德高度的思維與足夠文明的司法定奪判準，來處理這些複雜異常的人性問題。從民主深化的角度來看，尤其重要的是，面對這種「共業」的案例，應該探討的方向，不是被誤導去說「天

下烏鴉一般黑」；而是更應由此深深地看到，威權「體制」如何徹底將人工具化、物化，以至於人的心靈被推向「去人性化」的方向走去，最終淪落到寧可漠視親情、友情、愛情，一心只想「自保」。

此外，從中東歐推動轉型正義的經驗來看，也清楚顯示出，轉型正義應從許多不同層面加以推動，在追求司法正義與歷史真相的同時，也應該同時推動歷史傷痕的撫平與社會的和解。千萬不要單方面認為，只要推動特定的措施上路，就可以讓轉型正義畢其功於一役。

中東歐新興的民主國家在脫離共產黨統治後，在 1990 年代紛紛透過制定「除垢法」（*lustration law*）（註 9）與開放秘密警察檔案來推動他們的轉型正義。這兩個互為表裡的做法是當時中東歐新聞媒體不斷談論的話題，也是臺灣社會對中東歐轉型正義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以捷克為例，除垢法的施行，原來是作為共產黨體制轉換到民主體制一個過渡時期的措施，希望透過去除過去的加害者與專制體制共犯在公部門服務的機會，讓公部門的運作上軌道。原先設定的實施時間只有五年，但後來，卻延長到十年，甚至最後被視民主化深淺最重要的指標。（註 10）然而，大家常忽略的是，除垢法（*lustration law*）與開放秘密警察檔案帶來的負面副作用也不容小覷。（註 11）只有進行政治清查，並不是就可以順利自然導向民主自由。（註 12）對只是從事政治清查來進行轉

型正義的疑慮，吳乃德教授也曾表示過類似的意見。（註13）

提出這些史實，並不是在論斷，在轉型正義的過程中，究竟哪些措施可以做、或哪些不該做，畢竟這些都需要交由公民社會共同來決定。但是希望提醒，「真相」與「和解」雖然常因「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名稱被廣泛使用，而容易讓大家產生錯覺，以為這原本就是互相依存而生的概念。實際上的歷史經驗是，在轉型正義過程中，「真相」與「和解」並不容易同時並進，這其中需要更多的配套措施來使兩個目標可以靠攏在一起，而不是越行越遠。

以德國進行的第二次轉型正義經驗為例，兩德民主統一後，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第一位以選舉方式產生出來的校長 Heinrich Fink 教授（1935-）因為在 1990 年時可供比對的秘密警察檔案資料不多，順利通過了「除垢」檢查，當上校長。然而，1991 年 11 月，當時秘密警察檔案館聯邦特任官高克（Joachim Gauck）依據 Fink 在 1987 年獲得東德國安部金牌獎勵的證據，公布 Fink 具有線民身份。Fink 因此在 1992 年 1 月被洪堡大學無限期解聘。事發之後，Fink 遂加入東德共產黨轉型後成立的政黨 PDS，將自己塑造為被聯邦德國迫害的受難者，開始號召德東地區的人團結起來對抗聯邦德國。（註14）

以上的事例都清楚顯示出，轉型正義的確不是一件簡單而且可以憑藉做出特定的

措施就可順利完成的工作。畢竟揭露真相，在某些層面上雖有助於和解；（註15）但有些時候，因為舊傷讓人重回往日受傷的情境，未必能促成和解。（註16）如何在進行司法平復的過程中構築完善的配套措施，幫助社會和解，是很重要的工作。（註17）

## 中東歐轉型正義 25 年後的歷史省思

英國政治學者 Roman David 在 2010 年曾對歷經轉型正義後的捷克做過全國性調查，他指出，儘管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36-2011）總統當年曾呼籲，捷克在從事轉型正義時，應以更寬容的道德高度來執行，但面對前捷克共產黨對自己過去所作所為毫無道歉和解之意，捷克公民社會為了對抗前共產黨的頑固態度，在執行轉型正義過程中，還是留下一些讓人感到遺憾之處。根據 David 的分析，除了哈爾維總統外，其他的政界意見領袖很少把「和解」當作轉型正義應該同時看重的價值來追求，（註18）如果當時能多注意以下三個問題，捷克的轉型正義應該可以比較沒有缺憾：（1）沒有積極跟民眾溝通、宣導，「和解」是轉型正義追求的珍貴價值（the inability to convey the message of reconciliation as a worthy objective）；（2）缺乏促成社會和解的配套措施（the absence of a reconciliation program）；（3）社會

上可以促進和解的既有條件 / 資源有限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existing measures to contribute to reconciliation)。(註19) 這三個面向清楚顯示出，只是一味追求對過去不公不義的「平反」，忽略了在清理傷口時，也應同時追求撫平歷史傷痕。誠如 Roman David 所言，千萬不要天真地以為可以透過責罰與除垢法，就把共產黨與秘密警察線民變成民主政治的擁護者 (It seems naïve to expect that punishment and lustration would turn communists and secret service informers into democrats)。(註20)

## 德國轉型正義在行政與司法部門之外所做的努力

透過公共參與來促進轉型正義工程可以推動得更加順暢，而不是讓轉型正義侷限在政府行政部門與司法部門的工作，聯邦德國的經驗相當值得參考。畢竟沒有一個國家像德國那樣，在二次戰後短短 50 年內，需要進行兩次性質大不相同的轉型正義：第一次是針對納粹大屠殺，在時間上從二次戰後開始，但到了艾德諾上臺後形同被擱置，直至 1960、1970 年代才又重新上路。第二次是隨著柏林圍牆倒塌、兩德民主統一，而針對前東德共產政權的黨產與侵犯人權問題所進行的轉型正義工作。這兩次轉型正義，在德文裡是用不同的詞語來表述，第一次是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超克過去)，

第二次是 Aufarbeitung der SED-Diktatur (清理東德共黨極權統治遺緒)。

從用詞上可以清楚看出，第一次轉型正義面對的，不僅是納粹的過往，而且更包括導致德國走向納粹獨裁的整個「歷史過往」。換言之，那是透過對整個德意志歷史文化的全面性檢討，痛定思痛找出何以德國會讓國族主義的狹隘激情走向視「他者」為非除之而後快的瘋狂屠殺行徑？用當代德國重量級的歷史學者溫可勒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的話來說，經過希特勒慘無人道的極權統治後，過去普魯士王室御用史家蘭克 (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 提倡歷史研究應該考察「實情究竟是如何？」(“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 的見解已不足用；當代史學研究更該有勇氣去探問：「為什麼事情可以被操弄到這種地步？」(“Warum es eigentlich so gekommen ist?”)；(註21) 或者如另一位歷史學者 Peter Graf von Kielmansegg 所說：「因為這場災難，德國才真正學會如何落實民主；因為這場災難，德國才學會如何融入歐洲國際社會；因為這場災難，德國人被迫重新定義自己。」(註22) 對聯邦德國而言，處理納粹政權的轉型正義工作，不只牽涉到對戰犯的審判、民主體制的轉型，而且也牽涉到整個社會文化體質的積極改造、以及社會價值觀的重新建立。

第二次的轉型正義則是民主化根基已經相當穩固的聯邦德國處理前東德共產黨專

制統治遺緒的問題。除了東德共產黨的黨產外，對前東德民眾而言，他們最在意的是前東德國安部（Stasi）的秘密警察檔案。因此如何在聯邦德國民主法治的架構下，妥善處理檔案開放問題，是這一次轉型正義最引人矚目的問題。

這兩次不同的轉型正義歷程，很重要的共通點在於，非常重視民眾「知」的權利，不僅以紮實、有普世價值關懷的學術研究作民主深化普及教育的支撐，而且也廣泛透過公共對談、普設紀念碑與紀念園區，來讓轉型正義所連結到的歷史記憶，成為具有公共化意義的歷史記憶。

舉例來說，當初擘畫制定「猶太人最後解決方案」（Endlösung, “Final Solution”）的「萬湖會議之屋紀念園區」（Gedenkstätte 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自1996年起，在基督新教「為贖罪而行動和平志工服務」（Aktion Sühnezeichen Friedensdienste, 簡稱ASF, 英譯：Action Reconciliation Service for Peace）贊助下，讓猶太受難者後代到該園區擔任導覽志工，不僅讓他們以受害者後代的身份對國際個參訪團體進行納粹時期歷史的解說，同時也讓他們在此廣泛閱讀各種與加害者相關的資料，並與德國各領域的人就各種與納粹歷史相關的議題廣泛對談。（註23）

此外，自1992年起，科隆藝術家 Gunter Demnig 發起在全歐鋪設「紀念石」（Stolpersteine）的紀念藝術行動。這是以

寫著受難者生命簡史與受難事蹟的10公分見方黃銅小牌鋪設在納粹受難者故宅門前的馬路上，讓行經的人都能看到過去發生的歷史悲劇，也讓歷史記憶成為大家在日常生活裡可以不斷重溫的記憶。根據統計，截至2015年4月，已經有超過56,000片「紀念石」鋪設在歐洲18個國家，紀念的受難者包括猶太人、辛提與羅姆人（Sinti and Roma）、同性戀者、耶和華見證者教派信徒、黑人、與其他許多起來反抗希特勒的人。（註24）這完全是公民社會自發性的行動，並沒有仰賴政府公部門的介入。

此外，德國學術界也透過大規模的調查，了解不同世代面對歷史傷痕在認知上變遷的情況。這種結合心理療癒的學術研究調查，積極促使加害者對自身的處境有深刻的了解，進而願意積極認知歷史真相，並參與歷史和解的工作。

在這方面，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研究是兩德民主統一後，由社會心理學家 Harald Welzer 的研究團隊針對德國的家庭如何面對納粹過往所做的調查。這個研究調查結果於2002年出版成專書：《爺爺不是納粹：德國家庭記憶裡的納粹歷史與大屠殺》（*Opa war kein Nazi«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Holocaust im Familiengedächtnis*）。（註25）這個研究團隊在1997至2000年間訪談了40個家庭（30個來自過去的西德，10個來自過去的東德），共包含對142位成員（分屬祖、父、孫三代）單獨進行訪談。

Welzer 教授跟他的研究團隊想要了解，在學校課堂之外，一般普通德國百姓（不具有極端政治傾向）在家人彼此之間的日常生活談話裡，如何談論納粹過往？長輩（父母輩與祖父母輩）如何跟孩子與孫子輩談他們在納粹時代的所作所為？戰後才入學的孩子與孫子輩又如何回應學校所教的歷史？（註 26）

《爺爺不是納粹》這個計畫的研究結果可以從以下四點看出最值得注意之處：第一，家裡長輩對兒孫所講的記憶很容易受到與二戰歷史相關的電視劇或電影裡的故事情節影響，經常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而改變。第二，長輩的講述是有選擇性的。大多數的人不是將自己描述為「受害者」、不然就是英雄。但是很少人會去講述自己何以甘於屈從在邪惡體制之下。第三，在長輩講述自己親身經歷時，經常在不知不覺中就把納粹時代的意識形態繼續傳給下一代。第四，在講述到有關「加害」部分的歷史時，講述的長輩通常不會意識到這是加害者的歷史。對集中營的大屠殺歷史，通常會用「我們當時並不知情」來帶過。（註 27）

根據這個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大部分「戰火下的第三代」（即孫子輩）雖然都認知到整個納粹政權影響下的德國是一個龐大的共犯結構，但是究竟誰是這個共犯結構一員，評估的底線卻是，要看在哪個範圍內，自己的親人不算是涉入的共犯。（註 28）

在上述的研究基礎上，2010 年 10 月，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繼續追蹤戰火下第四代（親身經歷者的曾孫輩）面對納粹歷史的態度，發現有了相當大的轉變。

（註 29）根據這個調查，德國社會對納粹歷史過往的認知，親情的糾結要到第四代（曾孫輩）才會鬆開。因為曾孫輩跟親涉歷史事件的曾祖父母輩通常沒有直接接觸的印象，因此「這件事多少與我直接相關」的顧忌淡薄許多。他們絕大部份願意相信自己的先人曾經涉入納粹共犯的行為，但不會覺得承認這件事會有「背叛」自己的家庭的疑慮。這個研究清楚顯示出，如果有好好進行轉型正義，像納粹大屠殺這種歷史悲劇大概仍須三、四個世代才能走出歷史陰影的干擾。

從 1980 年代中葉起，精神科醫師 Hartmut Radebold（1935-）也開始注意到，1928 至 1947 年間出生的那一輩德國人在進入中老年後有不少人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註 30）這群被他稱為「戰火下的孩子輩」（Kriegskinder, “war children”）的患者很容易因為創傷後的記憶經常跳脫特定時空的記憶框架，不自覺地湧現在日常生活中，結果造成負面情緒不時會無緣無故侵入患者正常的生活。2002 年，Radebold 醫師與歷史學者羅伊雷克（Jürgen Reulecke）合組「二戰與童年」（*weltkrieg2kindheit*）跨領域研究團隊，對二戰時期的德國兒童進行有系統的深入研究。透過這個團隊研究的結果，他們發現，

二戰期間，德國約有六成的兒童與青少年在生活上受到戰爭影響。受到影響的兒童與青少年平均有三至四次逃難、被驅逐、空襲、受飢寒、被暴力脅迫、甚至被強暴的經驗。(註31)

2010年拉德博醫師出版了一本書《缺席的父親與戰爭年代的童年：超克陳年心裡舊傷》(*Abwesende Väter und Kriegskindheit: Alte Verletzungen bewältigen*)。(註32)這本書探討了「戰火下的孩子輩」面對納粹父親時，糾結的心理問題。根據他的估算，全德國「戰火下的孩子世代」大約有3%至5%自二戰結束後，就一直被「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困擾。30%至35%則隨著年齡漸長，病情轉趨嚴重；另有三分之一的老年人雖有病情，但因社會或家庭支援足夠，並不影響正常的生活。(註33)

拉德博醫師指出，有些向他求診的病患明知自己的父親在納粹時代確實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但仍拒絕承認事實，繼續以高度理想化的心態維持自己心中父親的美好形象。(註34)面對病患抗拒對現實產生真實感，作為心理醫師，他會選擇要病患清楚地面對歷史真相；也鼓勵他們將自己實際的遭遇寫下來，將自己腦海裡的記憶與各種書信、日記、以及照片結合起來，透過公開或出版，跟自己的孩子以及外在世界進行深入的對話。因為，開啟這種有建設性的對話過程，效果跟心理治療一樣好。因為加害者

的子孫不想正視過去，過去並不會因此就消失。反之，不管對加害者還是受害者而言，壓抑的心靈創傷所造成的「後果」是有跨世代感染給下一代(*transgenerationale Weitergaben*)的可能。畢竟孩子很容易受到父母親焦慮的情緒、或突然其來爆發的負面情緒影響。(註35)

在拉德博醫師研究的基礎上，科隆的新聞記者Sabine Bode接著繼續追蹤「戰火下的孩子輩」長大成人組成家庭後，被他們教養長大的孩子——也就是她研究1960至1975年間在戰後西德「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裡成長起來的那一代「戰火下的孫子輩」(*Kriegsenkel*, “*war grandchildren*”)——會遭遇哪些問題。Bode在2009年出版了《戰火下的孫子輩。被遺忘世代承受的重擔》(*Kriegsenkel. Die Erben der vergessenen Generation*)，(註36)她在書裡提到，「戰火下的孫子輩」生長的大環境因為經濟富裕了起來，許多家庭問題或父母親長期情緒不穩定的問題反而因此被視而不見。小孩應從家庭與父母處獲得安全感的問題，也因此被嚴重忽略了。(註37)

這些結合精神醫學與歷史學的跨世代心理研究，對曾經進行過轉型正義的國家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參考依據。這些研究成果不僅可以幫助社會去了解「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處境，並且透過醫學上的診治並不分「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諮商與治療，為整個社會心靈康復尋求另一種值得採納

的有效療癒途徑。就世界上曾經推動過轉型正義國家所累積的經驗來看，德國從精神醫學方面所下的努力、以及截至目前所累積的經驗，都非常值得注意。

### 結語

跟中東歐其他鄰國相較之下，德國的轉型正義有兩個很不一樣的特色。一是因為在納粹時期德國是以國家整體的力量作為「加害者」，因此，如何透過各種管道追求和解、進行歷史傷痕療癒，他們累積了相當多的經驗。相對於中東歐其他國家在推動轉型正義四分之一世紀後，普遍感到「和解」不足的問題，德國透過公部門與非政府組織、各種宗教團體多管齊下所進行的歷史和解工作，值得注意。

第二點是民主的深化。不管是教科書、公民民主教育的推廣、還是紀念園區所提供的各式各樣參考資訊與討論活動，德國竭力透過良好的教育，深化每一個年輕世代對公民社會與民主人權的認知。對於過去的轉型正義沒有處理周全的地方，他們也透過持續的追蹤調查，不斷找出尚未處理好的地方，繼續加以處理。

歷史如果是複雜的，解決複雜的問題就不能只用單一藥方，而需多管齊下。「轉型正義」如果要成功，而且能夠真正達到撫平歷史傷痕、促成社會和解的地步，應該從各種管道、各種不同的層面來推動。真相的調

查與司法的平反是其中一環，但是與之同時並進的，應該透過文學、藝術、宗教、學術……許許多多相關領域的共同參與，既有「正義」的介入，但有能從心靈層面好好處理「人心是肉做的」這些情感/情緒面的問題。

此外，我們也應注意，轉型正義本質上是體制的翻轉，由威權政治轉向可以正常運作的民主、人權、法治。如果希望民主政治能夠健全發展，就需要好好關注我們的國民教育內容，是否真的有做到以民主、法治與人權作為核心內容，而不再是任由過去威權時代的教育內容與做法繼續宰制我們第一線的教育現場。

過去的臺灣習慣於一種簡化的、受中國「官史」論述傳統影響的黑白二分法歷史思維。談到過去，總是要先分好人、壞人；再加上受到十九世紀、二十世紀國族思想影響，更喜歡區分「我者」與「他者」。對「我者」十分寬容，對「他者」極為嚴苛。但是進入民主多元時代，我們如果真的要打造追求和解、可以互相信任的社會，培養重視「人權價值」與「寬容異己」的多元精神，才是公民社會真正可以成功的基礎。人類的歷史其實從來就不曾「簡單」過，就像人性的幽微從來就不是黑白兩個顏色可以盡括那樣。只有當我們懂得將轉型正義的過程視為社會自我啟蒙、自我提升的過程，願意以具有道德高度的視野來面對歷史的複雜性，與轉型正義相關的歷史過往才能提供

我們借鏡，知道如何避免重蹈國家暴力蹂躪人權與人性尊嚴的錯誤；進而不要讓過去錯誤的歷史糾纏社會的心靈，甚至於繼續困擾下個世代。

#### 【註釋】

1.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The National Interest* 16 (Summer 1989). 此文後來改寫成書出版：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2. 參考匈牙利與波蘭近年來的政治發展隱憂：“Illiberal central Europe: Big, bad Visegrad,” *The Economist* (Jan. 30, 2016), <http://www.economist.com/news/europe/21689629-migration-crisis-has-given-unsettling-new-direction-old-alliance-big-bad-visegrad?zid=309&ah=80dcf288b8561b012f603b9fd9577f0e> (accessed July 26, 2016); Tomasz Kurianowicz, "Przemek Wojcieszek im Gespräch: Politische Satire hat es auch in Polen schwer,"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July 26, 2016), <http://www.faz.net/aktuell/feuilleton/debatten/przemek-wojcieszek-ueber-politische-satire-in-polen-14187707.html> (accessed April 2016).
3. Hannah Arendt,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in her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ed. Jerome K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3), p. 95.
4. 相關報導參見：<http://www.zeit.de/kultur/literatur/2016-07/ungarischer-schriftsteller-p-ter-esterh-zy-ist-tot> (accessed July 24, 2016); <http://www.spiegel.de/kultur/literatur/peter-esterhazy-ist-tot-wenn-unsterbliche-sterben-a-1103116.html> (accessed July 24, 2016).
5. Lavinia Stan and Nadya Nedelsky, eds.,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al Justice: Lessons from Twenty-Five Years of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xv.
6. S awomira Cenckiewiczza and Piotra Gontarczyka, SB a Lech Wa sa. *Przyczynek do biografii* (Warsaw: IPN, 2008); Aleks Szczerbiak, "Explaining Late Lustration Programs: Lessons from the Polish Case," in Lavinia Stan and Nadya Nedelsky, eds.,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al Justice*, pp. 51-70, here pp. 65-66.
7. Martin M. Sobczyk, "Poland's State Archives Releases Lech Walesa Document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Remembrance says files show t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was a Communist sp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2,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wsj.com/articles/polands-state-archives-releases-lech-walesa-documents-1456158176> (accessed July 24, 2016).
8. Aleks Szczerbiak, "Explaining Late Lustration Programs: Lessons from the Polish Case," p. 56.
9. Daan Bronkhorst, "Lustr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ruth and Justice" (2006), available at: <https://www.amnesty.nl/part-ii-lustration-in-central-and-eastern-europe-truth-and-justice-june-2006-daan-bronkhorst> (accessed July 24, 2016).
10. Roman David, "Transitional Justice Effects in the Czech Republic," in Lavinia Stan and Nadya Nedelsky, eds.,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al Justice*, pp. 97-120, here p. 104.
11. Roman David, "Lustration Laws in Action: The Motives and Evaluation of Lustration Policy in the Czech Republic and Poland (1989-2001)," *Law and Social Inquiry* 28:2 (April 2003), p. 388.
12. *Ibid.*, p. xv.
13. 吳乃德，〈民主時代的威權遺產〉，收入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編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新北市：衛城出版社），卷一，頁 43-60。
14. Joachim Gauck, *Winter im Sommer—Frühling im*

- Herbst. Erinnerungen* (München: Siedler Verlag, 2009), pp. ; 花亦芬,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 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臺北市: 先覺出版社, 2016年), 頁344-345。
15. James L. Gibson, "Does Truth Lead to Reconciliation? Testing the Causal Assumptions of the South Africa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Proces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8:2 (2004), pp. 201-217.
  16. David Roman and Susanne Y. P. Choi, "Forgiveness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the Czech Republic,"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50:3 (June 2006), pp. 339-367.
  17. David Mendeloff, "Truth-Seeking, Truth-Telling, and Post-conflict Peace-building: Curb the Enthusia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6 (2004), pp. 355-380.
  18. Roman David, "Transitional Justice Effects in the Czech Republic," pp. 114-115.
  19. Roman David, "Transitional Justice Effects in the Czech Republic," pp. 98-99, 102.
  20. *Ibid.*, p. 100.
  21. Heinrich August Winkler, *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 vol. 1, 7<sup>th</sup> edition (München: Verlag C. H. Beck, 2010), p. 3; 花亦芬,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 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頁23。
  22. Peter Graf von Kielmansegg, *Nach der Katastrophe. Eine Geschichte des geteilten Deutschland* (Berlin: Siedler Verlag, 2000), pp. 10-11.
  23. 花亦芬,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 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頁391-400。
  24. "Holocaust-Gedenken / Münchner kämpfen für Stolpersteine." *Die Welt* (April 29,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welt.de/regionales/bayern/article140254863/Muenchner-kaempfen-fuer-Stolpersteine.html> (accessed July 26, 2016).
  25. Harald Welzer, Sabine Moller, Karoline Tschuggnall, »*Opa war kein Nazi*«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Holocaust im Familiengedächtnis* (Frankfurt/M: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2).
  26. *Ibid.*, p. 11; 花亦芬,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 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頁424-427。
  27. Harald Welzer, Sabine Moller, Karoline Tschuggnall, »*Opa war kein Nazi*«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Holocaust im Familiengedächtnis*, p. 54。
  28. *Ibid.*, 207.
  29. Christian Staas, "Was geht mich das noch an?" *Zeit online* (Nov. 4, 2010), <http://www.zeit.de/2010/45/Erinnern-NS-Zeit-Jugendliche> (accessed April 2016).
  30. 以下相關之敘述亦請參考: 花亦芬, 《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 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 頁406-415。
  31. 此研究計畫之結案報告請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client=safari&rls=en&q=forschungsgruppe+weltkrieg+2kindheiten&ie=UTF-8&oe=UTF-8&gfe\\_rd=cr&ei=0BeXV6yCOYuB0ATW0JzABA](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client=safari&rls=en&q=forschungsgruppe+weltkrieg+2kindheiten&ie=UTF-8&oe=UTF-8&gfe_rd=cr&ei=0BeXV6yCOYuB0ATW0JzABA) (accessed July 26, 2016).
  32. Hartmut Radebold, *Abwesende Väter und Kriegskindheit: Alte Verletzungen bewältigen* (Stuttgart: Klett-Cotta, 2010).
  33. *Ibid.*, pp. 15-18.
  34. *Ibid.*, pp. 136-148.
  35. *Ibid.*, pp. 220-230.
  36. Sabine Bode, *Kriegsenkel. Die Erben der vergessenen Generation* (Stuttgart: Klett-Cotta, 2009).
  37. 相關書評見: Karin Janker, "Die Kinder der Traumatisierten," *Süddeutsche Zeitung* (Sept. 12, 2015), available at: <http://www.sueddeutsche.de/politik/spaetfolgen-des-zweiten-weltkriegs-die-kinder-der-traumatisierten-1.2632536> (accessed July 26, 2016).